



文/图 王腾腾

清末东昌府堂邑刻工徐凤池考述

东昌刻书起源自晋南平阳府(今临汾),始于明洪武初年(1368年)。平阳在金元时期即是刻书重地,时至明初,当地大量刻工随移民迁入东昌府,散居于堂邑骆驼山一带。这些刻工手艺出色,刀法圆熟,借助骆驼山一带盛产梨木、枣木之优势,较好地传承了雕版印刷技艺。

堂邑距聊城(东昌府治)仅40里(1里等于500米),不少堂邑人刻印启蒙读物或通

俗读物来聊城串卖,颇为畅销,直接促进了东昌书坊的诞生与发展。据吴云海《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》引李复元先生云:“远在明代中叶,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卖、规模很小的书馆,字号叫好友堂。”后经不断发展,加上大运河漕运便利之影响,时至清代,聊城书坊出现井喷式增长,字号可查的书庄就达60余家。这些书庄大多雇堂邑刻工,自刊自印,图书广销天下。其中,尤以书业德、善成堂、有益堂、宝兴堂四大书庄为最。有益堂、宝兴堂各有书版500余种,而书业德、善成堂各有上千种。

民间书坊能有如此大的出版量,放眼全国亦属罕见。这与堂邑具有充足刻工不无关系,堂邑刻工可谓东昌刻书业的重要支撑。唐桂艳《清代山东刻书史》云:“到了清代,聊城的不少书庄直接从堂邑请刻工,可

以说,对刻书中心资源的利用,促使聊城刻书业迅速发展起来。……堂邑是山东重要的刻书地。”

至清中后期,堂邑雕版印刷已然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。据《堂邑县乡土志·商务》载:“本境(堂邑)制造而多销于他处者,印书之板,染色之纸……往往在京都、汴梁及本省济南、东昌等处设局出售。”而堂邑雕版最为风行处,当数城西十八里骆驼山一带的村落。这里的百姓,大都掌握祖传的雕版技艺,把雕版作为主要的副业。据吴云海《堂邑木板雕刻记略》载,堂邑三奶奶庙村、后杏园、景屯等均与骆驼山周围的村庄,家家妇女都会攥刀把,通过“揽头”为坊铺进行“外加工”。堂邑刻书之盛,可窥一斑。

堂邑刻工群中最负盛名者,非徐凤池莫属。

恩赐介宾 刻工领袖

徐凤池,字佩声,山东东昌府堂邑三奶奶庙人。清代著名雕版刻工。其父徐天佑曾恩赐军功,生有四子,即凤仪、凤池、凤楼、凤阁。徐凤池行二,曾恩赐介宾;三弟凤楼为廪生;四弟凤阁为邑庠生。徐凤池生有三子,次子名清湘,清湘之子名鸿轩。徐鸿轩,亦名徐运北,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、卫生部副部长、第二轻工业部部长等职。2018年去世,享年104岁。

徐凤池生卒年不详。今按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同兴堂《徐氏族谱》,凤仪、凤楼、凤阁兄弟三人生卒均有详录,唯凤池无存,不知何故。其兄凤仪生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三弟凤楼生于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概知徐凤池生于道、咸间。又,民国二年(1913年)徐凤楼《修族谱叙》载:“合族父老即以修谱之事商之于余……自思废学多

年,荒疏已久,恐不能胜任。又与胞弟凤阁商议,凤阁弟曰:‘此美事也,何可辞劳?’”据此可推,民国二年之前,徐凤池就已离世,故而三弟徐凤楼主持家族修谱之事。循此理路,徐凤池刻书活动当主要集中于同治、光绪间。

徐凤池所在的三奶奶庙村是堂邑刻工最为集中的村落。实际上,三奶奶庙村乃两村之合称,可分为东三奶奶庙村与西三奶奶庙村(俗称东三庙与西三庙)。东、西两村以杨氏、黄氏、徐氏家族为盛。诸家族皆曾以雕版为业,并有世代传承。曹之先生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中介绍清代东昌刻书时云:“东昌、四堡刻书也比较发达。……自元代以后,东昌为南北漕运要冲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东昌刻工也有到外地谋生的,例如北京文成堂刻《四书备旨》《大学》等书就是由

东昌府堂邑县刻工杨金雄雕版的。”杨金雄便是东三奶奶庙村人,与刻工杨金维(冠县雕刻艺人陈庆生的姥爷)属同辈兄弟,皆为清代著名刻工。而杨氏兄弟的雕版技艺,均受学于西三奶奶庙村的徐凤池。

徐凤池曾恩赐介宾。清制,每岁由州县遴选年高而有声望的士绅,一人为宾,次为介宾,又次为众宾,详报督抚,举行乡饮酒礼。同时,朝廷以冠带表示礼遇乡贤的规格。显然,徐凤池隶属乡贤无疑。徐凤池家族观念浓厚,将刻板技艺倾囊相授于族人。随着徐氏家族刊梓工人不断增多,刻板技艺愈发精湛,三奶奶庙村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堂邑刻书第一村。

徐凤池技艺高超,慕名前来拜师之人亦络绎不绝。在其带动下,附近东三奶奶庙、黄寨子、许堤口等诸多村雕版艺人越来越多。书坊主对其颇为敬重,争相聘请。相较于年画,刊刻书版收入更为可观,旧时堂邑雕版还是以书版为主。

刻书多种 牌记醒目

徐凤池刻书多种,目前,笔者集得带有牌记者三种:清善成堂《四书集注》、清善成堂《新订四书附考补注备旨》、民国十五年(1926年)书业德《奎璧书经》。另有两种笔者未得目验,其一,民国十四年(1925年)刻本《新订四书补注备解》十卷。关于此本,李国庆先生曾在《古代雕版刻工称谓考录——〈书林清话〉条目增补》一文中援引。李国庆认为,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未提刻工有所不妥,故依传本对刻工自称作以详考,计得七种:“曰某工,曰某人,曰某匠,曰某氏,曰某者,曰某生,曰某手。”种下又分小类,如“曰某工”种,可分“曰梓工,曰雕工,曰刊工,曰刻工”四类,每类各举一例,可窥刻工称谓之概貌。其所举“曰某人”种之“曰刻工人”类云:“民国十四年刻本《新订四书补注备解》十卷,山东东昌府堂邑县城西三奶奶庙

刻工人徐凤池。”

堂邑路庄一村民家中发现的祖传古籍中,清善成堂版《四书备旨》书尾印有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城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字样,而笔者所藏善成堂《新订四书附考补注备旨》书尾印“徐凤池刊工”字样,概知此二书有别,并非同种。

细审徐凤池刻书,其大字方板整齐,横轻竖重;小字字形长方,清秀瘦挺;撇长而尖,捺拙而肥,颇为美观。又据版心题署可知,徐凤池既为书业德刊刻,又为善成堂刊刻。作为东昌府的两大书坊,书业德与善成堂互有竞争。徐凤池能让二者并驱争用,在聊城刻书史上堪称奇迹。

坊刻本单独著录刻工且以醒目牌记形式标出者少见,而徐凤池有此待遇,亦可证明其在当时极负盛名。记刊刻者的牌记能够单独一页,说明此刻工颇受书坊主敬重,而徐凤池刻书牌记多有独占一页的情况,如《四书集注》《奎璧书经》等,其他堂邑刻工则不多见。徐凤池刻书牌记在位置、形式与内容上并不固定,花样繁多。就位置而言,或于序末,或于卷末,或于书尾,均较为醒目;就形式而言,字周有无线、单线、双线等多种墨围,字形或扁方、或正方、或长方,多宋体;目前可知题名款式至少三种,为“堂邑徐凤池刻”“徐凤池刊工”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,第一种常见。

古时刻工终日与木板、刻刀为伍,社会地位普遍低下。李国庆先生总结明清刻工题款特点云:“刻工题名款式单一,仅在姓名前面冠上称谓。”而“徐凤池刊工”牌记反将姓名置前,且不加籍贯,字大醒目,颇为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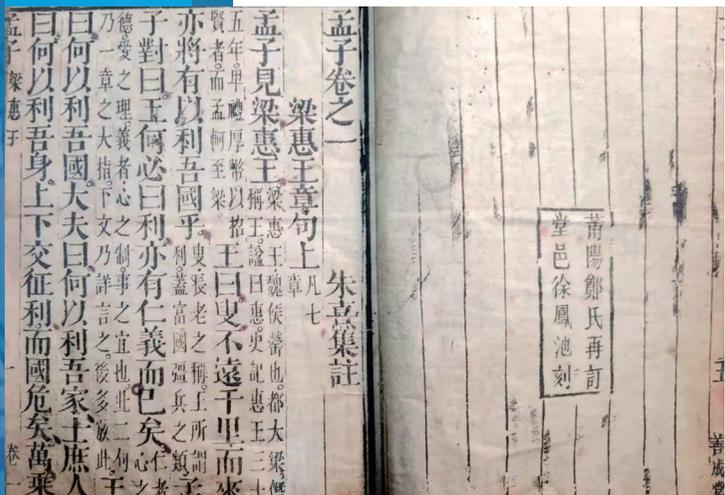
信,非寻常刻工可为。

李国庆先生援引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佐证记刊刻者牌记有“刻工人”称谓,此类刻工题署已是少见,而籍贯涵盖“省、府、县、村”四级者,则更属罕有。李国庆先生又于《山东籍雕版刻工辑略》一文中复引此则牌记云:“这则木记所载内容是迄今所见山东籍雕版工匠题名最为详细的一例。”可为参证。“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”牌记款式精美,端庄大气,有意突出“东昌府”“三奶奶庙”“徐凤池”字样,明显经过精心设计。相比于其他堂邑刻工,无论是从形式抑或内容来看,徐凤池皆独树一帜。

在历代传本中,刻工能自署名且加籍贯者,并不常见;而为之专设牌记,刻意修饰,并独占一页者,则更如凤毛麟角。徐凤池在东昌书坊获此待遇,足见坊主对其之倚重。究其缘由,除徐氏技艺精湛外,亦与其出身不无关系。徐凤池曾受朝廷恩赐介宾头衔,其父恩赐军功,诸兄弟皆属乡贤,家势背景对其刻书影响必有推助之功。

值得说明的是,堂邑三奶奶庙徐氏刻书一直绵延至民国晚期。今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有一本民国徐光明刻《中庸》,木记署款:“山东堂邑县三奶奶庙刻工徐光明”。检索民国徐家族谱可知,徐光明为徐凤池嫡长孙,徐运北堂兄。

囿于文献不足,徐凤池诸多事迹尚待详考。作为堂邑刻工的领袖人物,徐凤池并不独守绝技,自作藩篱,而是倾囊授艺,造福乡人。以徐凤池为核心的三奶奶庙徐氏刻书,为堂邑乃至东昌地区的刻书及木版年画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,深入挖掘其刻书事迹,对研究清代山东家族坊刻或有裨补之功。



《四书集注》(宋)朱熹 蒲阳郑氏再订 堂邑徐凤池刻